

目 次

一八九六年

我的一生 一个内地人的故事 /3

一八九七年

农民 /89

佩彻涅格人 /121

在故乡 /131

在大车上 /143

一八九八年

在朋友家里 故事 /155

套中人 /174

醋栗 /187

关于爱情 / 197

姚尼奇 / 206

出诊 / 225

一八九九年

宝贝儿 / 239

新别墅 / 251

公差 / 266

带小狗的女人 / 282

一九〇〇年

在圣诞节期 / 301

在峡谷里 / 307

一九〇二年

主教 / 349

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

补偿的障碍 / 367

一封信 / 376

一九〇三年

新娘 / 383

题解 / 402

一八九六年

我的一生

一个内地人的故事

—

主任对我说：“我留用您，纯粹是出于对您可敬的父亲的尊重，要不然，您早就从我这儿滚开了。”我回答他说：“大人，您认为我会滚开，未免过奖了。”这以后我就听见他说：“把这位先生带走，他惹得我冒火。”

过了两天光景，我就给辞退了。自从我被人看做成人以来，我照这样更换过九次工作，这使得我父亲，一个城市建筑师，十分伤心。我在各式各样的机关里做过事，可是所有那九种职务却彼此相像，就跟这滴水 and 那滴水相像一样：我总得坐着写字，听愚蠢的或者粗鲁的训斥，等着革职。

我去见我父亲的时候，他正靠在一把圈椅上，闭着眼睛。他的脸又瘦又干，胡子剃光的地方颜色发青，好像天主教堂里年老的管风琴师，现出谦卑的、听天由命的神情。他没有理睬我的问候，也没有睁开眼睛，只是说：

“要是我那亲爱的妻子，你的母亲，如今还活在世上，那你的生活就会成为她经常苦恼的源泉。她死得这样早，我看倒是天赐之福了。”他睁开眼睛，接着说，“请你教教我，你这倒霉的家伙，我该拿你怎么办呢？”

从前我年纪小的时候，我的亲人和朋友都知道该拿我怎么办：有的劝我去参军，有的劝我进药房，有的劝我进电报局，可是现在我已经满了二十五岁，两鬓甚至出现了白发，我已经参过军，做过药剂师，进过电报局，人间的一切工作我好像都已干过，别人就不再劝我，只是叹气或者摇头了。

“你对你自己是怎样想的呢？”父亲接着说。“一般年轻人到了你这种年纪都有牢靠的社会地位了，可是你看你自己，没家没业，穷叫花子，吊在你父亲的脖子上靠他养活！”

接着，他照例讲到现在的青年人都在自取灭亡，因为他们不信宗教，却相信唯物主义，过分的自高自大，还讲到业余演出应该加以禁止，因为这种玩意儿引诱青年离开宗教，放弃自己的责任。

“明天我们一块儿去，你要跟主任赔罪，答应他以后勤恳地工作，”他最后说。“你不应该没有社会地位，哪怕一天也不行。”

“请您听我讲，”我闷闷不乐地说，对这种谈话根本不存一点指望。“您所谓的社会地位是用金钱和教育换来的特权。没有金钱和没受过教育的人靠体力劳动来糊口，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理由应当成为例外。”

“你一讲到体力劳动，你那些话就又愚蠢又荒唐！”父亲气恼地说。“你要明白，蠢材，没脑筋的家伙，你除了蛮力以外还有神灵、圣火，圣火使你远远地高出驴子和爬虫，使你接近神！几千年来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得到这种圣火。你曾祖父波洛兹涅夫将军参加过波罗金诺战役^①，你祖父是诗人、演说家、首席贵族，你伯父是教师，最后我，你父亲，是建筑师！波洛兹涅夫家代代相传的这种圣火莫非要你来扑灭它！”

“应当公平才对，”我说。“成千成万的人都在从事体力劳动。”

“让他们去从事体力劳动好了！此外他们也不会干别的！体力劳动什么人都干得了，就连十足的蠢货和犯人都会干，这种劳动正是奴隶和野蛮人的特点，圣火却只有少数人才能得到！”

再谈下去也无益了。父亲崇拜自己，只有他自己说的话才能使他信服。此外我很清楚地知道，他这种对待粗重劳动的高傲态度骨子里倒不是出于对圣火之类的考虑，而是由于他暗暗担心我会去做工人，招得全城的人议论纷纷。主要的是所有我的同辈早已在大学里毕业，有了很好的前程，国立银行

^① 俄法 1812 年战争中最大的战役之一。在此次战役中，俄军于莫斯科西部波罗金诺村附近挫败了拿破仑一世统率的法军。

办公室主任的儿子已经做了八等文官，我这个独生子却什么也说不上！再谈下去是无益了，也不愉快了，可是我仍旧坐在那儿，无力地反驳他，希望他终于会了解我。其实，整个问题简单而明白，无非是我用什么手段维持生活罢了，可是父亲却不明白，找出些堂皇得肉麻的词句跟我讲什么波罗金诺，讲圣火，讲伯父，一个以前写过矫揉造作的坏诗、如今已经被人忘记的诗人，而且粗暴地骂我是个没脑筋的傻瓜和蠢材。而我多么希望他明白我的意思啊！不管怎样，我是爱我父亲和我姐姐的。我从小就养成习惯，做事总要请求他们的许可，这个习惯已经根深蒂固，日后恐怕也改不掉了。这样做对也好，不对也好，总之，我怕伤他们的心，我生怕父亲激动，看到他那细脖子涨红，生怕他就此中风。

“像我这样的年纪，”我开口道，“老是坐在一个不通风的房间里抄写，好比一架写字的机器，未免丢脸，难堪。这哪儿谈得上什么圣火呢！”

“这毕竟是脑力劳动啊，”父亲说。“可是算了，别再谈下去了。不管怎样我要警告你：要是你再不去上班，而放纵你那种可鄙的倾向，那我和我女儿就不再爱你。我当着上帝发誓：我要取消你的继承权！”

我十分诚恳地想要证明我的动机完全纯正，我打算一辈子照这原则生活，我就说：

“对我来说，继承权问题是无关紧要的。我预先声明，什么东西我都不需要。”

不知什么缘故，完全出乎我的意外，这些话深深地惹恼了我父亲。他的脸涨得通红。

“不准你这样跟我讲话，蠢材！”他用尖细的声音叫起来。“坏蛋！”他用敏捷、熟练、习惯的动作照准我的脸颊打了两巴掌。“你变得无法无天了！”

我小时候，父亲动手打我，我总是站得笔直，手心对着裤缝，直瞪瞪地瞧着他的脸。如今他打我，我张皇失措，仿佛我的童年仍旧在继续着似的，我挺直身体，极力盯着他的脸。我父亲苍老了，而且很瘦，可是他那瘦弱的胳膊一定像皮带那么结实，因为他把我打得很痛。

我往后退，退到了门厅，他在门厅抓起一把雨伞，照准我的脑袋和肩膀又打了好几下。这时候姐姐推开客厅的门，想看一看为什么这样吵闹，可是她立刻带着害怕和怜悯的神情扭转身去，没有替我说一句求情的话。

我那种不预备回办公室而打算过新的工人的生活的心愿已经没法动摇了。剩下来要做的只有选择哪种行业，这是不大困难的；因为我觉得我身体强壮，刻苦耐劳，最繁重的劳动也担得下来。我的面前摆着一种单调的工人生活，半饥半饱，周围一股臭气，环境粗俗，经常盘算工钱和面包。而且谁知道呢？日后我下工回来，走过大贵族街，也许会不止一次地嫉妒靠脑力劳动生活的工程师陀尔席科夫吧，可是现在我想到日后这种苦处反而觉着高兴。从前我也想望智力工作，一会儿想象自己做教师，一会儿想象自己做医生，一会儿想象自己做作家，然而想望始终只是想望罢了。我热烈地爱好智力方面的享受，例如看戏啦，看书啦；可是我究竟有没有从事脑力劳动的才干，那我就知道了。在中学念书的时候，我对希腊语厌恶极了，因此我念到四年级，家人只好把我从学校里领出来。家里有很长一段时期请了家庭教师给我补习功课，准备考五年级。后来我在各种机关里做事，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十分清闲地度过，而人家却对我说，这就是脑力劳动。我在校读书和在机关里做事都不需要很强的智力，也不需要什么天赋或者个人的才具，更不需要创造的热情，那是一种机械的活动。我把这样的脑力劳动看得低于体力劳动，我瞧不起它，我认为这种劳动决不能成为人们过无忧无虑的闲散生活的理由，因为这种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骗局，只不过是闲散的一种形式罢了。大概，真正的脑力劳动我还从来没见识过吧。

傍晚来临了。我们住在大贵族街，这是城里的一条主要街道。由于缺乏像样的城市公园，我们的上流社会的男女^①每逢傍晚总到这条街上来散步。这条美丽的街道好歹代替了公园，因为街道两旁栽种着白杨，散发出清香，特别是在雨后。另外从围墙里和小花园里露出一棵棵洋槐树、高高的紫丁香树丛、稠李树、苹果树。虽然春天年年来，然而五月的暮色，柔和清新的绿

^① 原文为法语。

荫，紫丁香的芬芳，甲虫的嗡嗡声，寂静，温暖，这一切显得多么新奇，多么不平常啊！我站在门口，看那些散步的人。我跟其中大多数人一块儿长大，从前一块儿玩过，现在我站在他们旁边却只能使他们发窘，因为我穿得寒酸，又不时髦，人家看到我那很窄的裤腿和又大又笨的靴子，就说这好比两条通心粉挂在海船上。此外，我在城里的名声不好，这是因为我没有社会地位，常在便宜的酒馆里打台球，也许还因为我有两次被人硬拉去见宪兵军官，而在我这方面其实并没有犯什么过错。

在街对面工程师陀尔席科夫的那所大房子里有人在弹钢琴。天色暗下来，星星开始在天空眨眼。这时候我父亲头戴一顶宽帽檐向上卷起的旧的高礼帽，挽着我姐姐的胳膊，一面跟熟人点头，一面慢慢地走过去。

“你看！”他对我姐姐说，同时举起刚才用来打过我的那把伞指着天空。“你看天空！那些星星，连顶小的也在内，都各成一个世界！跟宇宙相比，人是多么渺小啊！”

听他说话的口气，仿佛他为了自己这样渺小而觉得非常得意和愉快的。他是一个多么庸庸碌碌的人啊！不幸他是我们城里唯一的建筑师，就我的记忆来说，近十五年到二十年以来城里就没有盖过一所像样的房子。每逢人家来请他设计，他总是先画出大厅和会客室。如同旧日贵族女子中学的学生跳舞必得从炉子旁边跳起一样，他的艺术构思也只能从大厅和会客室开始，往前进展。他画好大厅和会客室以后，再画饭厅、儿童室、书房，各个房间都有门相通，结果那些房间就难免成了过道，每个房间都有两道以至三道多余的门。大概他的构思总是不清楚，非常杂乱，残缺不全。他每回都似乎觉得还缺点什么，就想出各种拼凑的办法，这儿添一间，那儿挤一间。我至今还记得那些又窄又小的穿堂，又窄又小的过道，弯弯曲曲的小楼梯，那些楼梯通往阁楼，人要站在阁楼里就非弯着腰不可，而且那里有三层大台阶代替地板，像是浴室里的蒸浴床。厨房一定在房子底下，盖着拱顶，地面铺砖。房子的正面显得笨重、呆板，一副干巴巴、十分局促的模样。房顶很低，是平的。在那些仿佛虚胖的粗烟囱上总是扣着用铁丝编的罩子，罩子上有一个吱吱响的黑色风向标。这些由我父亲设计建造的房屋彼此十分相像，

而且不知什么缘故总是使我隐隐约约联想到他那顶高礼帽和他那僵硬干瘪的后脑勺。日积月累，城里人也就看惯我父亲的平庸，于是这平庸生下根，变成我们的风格了。

父亲还把这种风格带到我姐姐的生活里来。首先他给她起名克娄巴特拉（如同给我起名米赛尔一样）。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他就给她讲星星啦，古时候的圣贤啦，我们的祖宗啦，还花很长的时间给她解释究竟什么叫做生活，什么叫做责任，弄得她战战兢兢，心里害怕。现在她已经二十六岁，他却仍旧讲他的老一套，只许她跟他一个人出门，挽着他的胳膊。不知什么缘故，他想象早晚一定会出现一个规规矩矩的青年人，由于尊敬他的人品而愿意跟他女儿结婚。姐姐呢，崇拜我父亲，怕他，相信他的不平常的智慧。

天色完全黑下来，街上渐渐没有行人了。对面房子里的音乐声停下来，大门打开，出现了一辆由三匹马拉着的马车，顺着我们的街道驶去，一路上小铃铛丁零丁零轻柔地响着。这是工程师带着女儿坐车出来兜风。我却该睡觉了！

正房里有我自己的房间，可是我住在院子里一个小屋里，这个小屋跟砖砌的堆房共用一个房顶。当初造这个小屋大概是为了存放马具的，墙上钉着大钩钉，可是现在这个小屋没用了，三十年来父亲在这屋里存放报纸，不知什么缘故还把这些报纸每半年装订成一册，不准人动一动。我住在这儿，父亲和他的客人看见我的机会就比较少。我觉得既然我不是住在一个真正的房间里，又不是每天到正屋里去吃饭，那么父亲说我靠他养活的话听起来就似乎不那么使人难受了。

姐姐在等我。她瞒过父亲把晚饭给我带来了：一小块冷的小牛肉和一小块面包。我们家里常常说这样的话：“钱要算计着花”，“积少成多”，等等，姐姐经不起这些俗套头的压力，就千方百计节省开支，因此我们伙食很差。她把碟子放在桌子上，在我的床上坐下，哭起来。

“米赛尔！”她说，“你在怎样对待我们啊？”

她没有用手蒙住脸，她的眼泪滴在她的胸脯上，手上。她的神情悲伤。

她一头倒在枕头上，尽情地哭泣，周身颤抖。

“你又辞职不干了……”她说。“啊，这是多么可怕呀！”

“可是你要了解我才好，姐姐，你要了解……”我说。她一哭，我就发急了。

仿佛故意捣乱似的，我那小灯里的煤油已经完全烧光，灯里冒出黑烟，灯就要灭了。墙上的旧钩钉样子怕人，它们的阴影跳动不定。

“可怜可怜我们吧！”姐姐坐起来说。“父亲非常伤心，我难过得简直要发疯了。你将来怎么办呢？”她问道，一面哭着一面向我伸出手来。“我求求你，我央告你，我用我们去世的母亲的名义请求你，回去工作吧！”

“我办不到，克娄巴特拉！”我说，觉得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屈服了。“我办不到！”

“为什么呢？”姐姐接着说。“为什么呢？是啊，要是你跟你的上司处不好，那就另外谋一个差事也行。比方说，你何不到铁路上去工作呢？我刚才跟安纽达·布拉果沃谈过，她断定铁路局肯用你，她甚至答应去替你奔走呢。看在基督分上，米赛尔，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吧，我求求你了！”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我就屈服了。我说：我还从来没有考虑到那正在修建中的铁路上去当差，我不妨去试一试。

她含着眼泪高兴地微笑，握住我的手，可是她仍旧在流泪，因为她自己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了。我就到厨房里去取煤油。

二

在本城具有慈善性质的业余演戏、音乐会、活画表演^①的爱好者当中，阿若京一家人可说首屈一指。她们住在大贵族街上私人的一所房子里，总是拨出房屋来供演出用，并且包揽一切杂事和开销。这个富足的地主家庭在本县有将近三千俄亩^②土地和一所豪华的庄园，可是她们不喜欢乡间，无论冬

① 一种表演方式：演员化装扮演某一场面，但不说话，无动作。

② 1 俄亩等于 1.09 公顷。

夏都住在城里。这家人包括一个母亲和三个女儿，母亲长得又高又瘦，身体很弱，留着短短的头发，穿着短短的上衣和一条平板的英国式的裙子；至于那三个女儿，人们在谈到她们的时候，不称呼她们的名字，只是简单地叫她们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这三个女儿都长着难看的尖下巴，眼睛近视，背有点驼，装束跟母亲一样，说起话来发音不清，很不好听；尽管这样，她们还是参加每次演出，经常为慈善事业出点力，例如演剧、朗诵、唱歌等。她们都很严肃，从不嬉笑，甚至在演出带歌唱的轻松喜剧的时候也没有现出丝毫快活的样子，而是做出一本正经的脸色，好像会计在算账似的。

我喜欢我们的演出，尤其喜欢那些一再举行的、有点杂乱的、热闹的排演，每次排演过后，她们总留我们吃晚饭。在选择剧本和分配角色方面我完全不管。我管的是后台的事。我画布景，提台词，化妆。我还负责制造音响效果，例如雷鸣、夜莺的啼叫等。由于我没有社会地位，又没有像样的衣服，每逢排演，我就躲在一边，站在侧面布景的阴影里，怯生生地一声不响。

我在阿若京家的堆房里或者院子里画布景。帮我忙的是个油漆工人，或者按他自己的说法，那就是油漆活儿的承包人。他叫安德烈·伊凡诺夫，五十岁上下，身量很高，长得很瘦，脸色苍白，胸部凹陷，两鬓也凹进去，眼眶下有黑眼圈，他的样子甚至有点可怕。他害着一种折磨人的病，每年秋天和春天大家都说他即将离开人世，可是他卧床一段时间后又起来了，事后总是惊奇地说：“我又没死！”

城里人叫他烈吉卡（萝卜），说这才是他的真正的姓。他也跟我一样爱好戏剧，只要听说我们在筹备演出，他就丢下自己的一切工作，到阿若京家里来画布景。

在我跟姐姐谈话的第二天，我从早晨到晚上一直在阿若京家里工作。排演规定在傍晚七点钟举行，在开始排演的前一个钟头，所有的业余戏剧爱好者已经在大厅里会齐，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在舞台上走来走去，手里拿着本子念台词。萝卜站在那儿，身上穿一件褪色的长大衣，脖子上围一条围巾，鬓角靠在墙上，眼睛瞧着舞台，现出一种虔诚的神情。阿若京家的母亲

时而走到这个客人面前，时而走到那个客人面前，对每个人都讲几句好听的话。她有一种习惯，喜欢盯着人的脸，小声说话，仿佛在说什么秘密的事情似的。

“画布景一定很不容易吧，”她走到我面前，小声说。“我刚才跟穆甫卡太太谈迷信的时候，看见您走进来。我的上帝啊，我这一辈子都在跟迷信斗啊！为了要女仆相信她们的那些恐惧多么没道理，我偏偏老是点三支蜡烛，偏偏在每月十三日那天动手办我的一切重大事情。”

工程师陀尔席科夫的女儿来了，她是个美丽丰满的金发姑娘。她的装束，照我们这里的人的说法，从头到脚都是巴黎式的。她不表演，可是在排演的时候人们总是在舞台上为她放一把椅子，一直要等到她穿着漂亮的衣服，周身放光，在头一排坐下，引得人人惊叹的时候才开排。她是从京城来的人，因此可以在排演的时候提意见。她一面提意见，一面总要露出可爱的、宽容的微笑，大家看得出她把我们的表演看做孩子的游戏。据说她在彼得堡的音乐学院里学过唱歌，甚至好像整个冬天都在一个私营的歌剧团里演唱。我很喜欢她，通常在排演和演出的时候我的眼睛总是离不开她。

我已经拿起本子来要开始提台词，不料我的姐姐来了。她没有脱掉大衣和帽子，径直走到我面前，开口说：

“我求求你，我们一块儿走吧。”

我就跟着她走。在后台的门口站着安纽达·布拉果沃。她也戴着帽子，帽子上带有黑面纱。她是法院副院长的女儿，这位副院长早就在我们城里任职，差不多在地方法院刚成立的时候就来了。他的女儿长得很高，身材匀称，因此大家认为她非参加活画表演不可，每逢她扮演菲雅^①或者天神，她就羞得满脸通红；可是她不参加演剧，即使到排演场上来也只待一会儿，总是为了接洽什么事，而且不肯走进大厅里来。就是现在也看得出来，她待一会儿就要走的。

“我父亲替您说过了，”她冷淡地说，眼睛没有看我，脸却红了。“陀

^① 西欧神话中的仙女。

尔席科夫答应在铁路上给您谋一个差事。请您明天去找他，他在家。”

我鞠躬，感谢她为我奔走。

“您可以把这个还给他们了，”她指着我的本子说。

她和我姐姐走到阿若京娜面前，跟她小声谈了大约两分钟，眼睛看着我。她们在商量什么事。

“真的，”阿若京娜走到我面前，盯着我的脸，小声说，“真的，如果这件事情弄得您放弃了正业，”她从我手里把本子拿过去，“那您可以把它交给别人。别担心，我的朋友，您去吧。”

我向她告辞，很难为情地走了。我走下楼去，看见姐姐和安纽达·布拉果沃正走出去。她们热烈地谈着什么，大概在谈我到铁路上去工作的事吧，她们匆匆忙忙地走着。以前姐姐从没到排演场上来过，现在她的良心大概在折磨她，她生怕父亲知道，她没得到他的许可就到阿若京家里来了。

第二天十二点多钟，我到陀尔席科夫家里去。听差领我走进一个很漂亮的房间，那是工程师的客厅，又是他的工作室。这儿一切东西都柔和、精致，对我这样没有看惯那些东西的人来说甚至显得古怪。这儿有贵重的地毯、大的圈椅、青铜器、绘画、镀金的和长毛绒镶边的镜框；相片分散地挂在墙上，那上面都是些很美的女人，面容聪明、妩媚，姿态大方。客厅的门直接通到花园里，从阳台上望去，可以看见紫丁香，看见一张上面已经摆好餐具，准备开早饭的桌子，许多瓶酒，一束玫瑰花。空中有春天的气息、贵重的雪茄烟的气息，总之是一派幸福的气息，一切都似乎极力想表明：这儿生活着一个人，他辛苦地工作过，终于得到了人间所能有的幸福。写字台旁边坐着工程师的女儿，她正在看报。

“您是来找我父亲吗？”她问。“他正在洗澡，马上就来。请坐。”

我坐下。

“您好像就住在我们对门吧？”沉默了一会儿，她又问。

“是的。”

“我因为闲得无聊，每天总是从窗口往外望，很冒昧，”她看着报说下去，“我常看见您和您的姐姐。她的神情老是那么善良、庄重。”

陀尔席科夫走进来了。他用毛巾擦着脖子。

“爸爸，波洛兹涅夫先生来了，”女儿说。

“是啊，是啊，布拉果沃对我说过了，”他很快地转过身来对我说，没有伸出手来跟我握手。“不过，您听我说，我能给您什么工作呢？我这儿有什么样的职位呢？你们也真是些怪人，先生！”他接着大声说，听他的口气，好像在申斥我似的。“每天总有二十个像您这样的人来找我，都以为我这儿有个机关！先生，我这儿只有铁路线，我这儿只有艰苦的活儿，我需要机械工、钳工、挖土工、木工、掘井工，可是你们却只会坐着写字，别的都不行！你们都是些要笔杆的！”

从他身上，就跟从他的地毯和圈椅上一样，冒出一股幸福的气息，向我迎面吹来。他又胖又健壮，脸颊发红，胸脯宽阔，洗得干干净净，穿着花布衬衫和肥腿的裤子，像是一个小孩玩的瓷制马车夫。他留着一圈拳曲的胡子，没有一根白发。他长着鹰钩鼻和一双乌黑、发亮、坦率的黑眼睛。

“您会做什么事？”他接着说。“您什么也不会做！不错，我是工程师，生活富裕，可是在人家要我修铁路以前我干过很长时间的苦差事，我做过机车司机，在比利时当过两年普通的加油工人。您自己想想看，年轻人，我该给您个什么差事呢？”

“当然，您说得不错……”我受不了他那对发亮、坦率的眼睛，感到惶恐不安，支支吾吾地说。

“至少您会管电报机吧？”他想了一想，问道。

“是的，我在电报局里做过事。”

“嗯。……好，那我们来试试看。您姑且到杜别奇尼亚去一趟。那儿我已经用了一个人了，不过他是个十足的废物。”

“那么我的职务是什么呢？”我问。

“到那儿再看吧。您暂且上那边去，我给他们下个命令。只是请您别酗酒，也别提出什么请求来打扰我。要不然我就把您辞掉。”

他甚至没有对我点一下头就扭转身走开了。我对他和他那看报的女儿鞠了躬，就走了。我的心头十分沉重，临到姐姐问我工程师怎样接见我的时

候，我连一句话也说不出。

为了到杜别奇尼亚去，我一清早，太阳刚出来，就起床了。我们的大贵族街上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大家都还在睡觉，我的脚步声孤零零地、低沉地响着。沾着露水的白杨使空气充满柔和的清香。我心里难过，不想离开这个城。我喜爱自己的城市。我觉得它那么美丽，那么温暖。我喜爱这苍翠的树木，这晴朗而宁静的早晨，我们教堂里当当的钟声；可是我又觉得那些跟我同住在这个城里的人乏味，跟我格格不入，有时甚至可恶。我不喜欢他们，也不了解他们。

我不明白所有这六万五千人为什么活着，靠什么活着。我知道基姆雷城的人靠做靴子过活，图拉城的人做茶炊和枪支，敖德萨是一个港埠，可是我们这个城究竟是什么，它做出些什么东西，我就知道了。大贵族街和另外两条比较干净的街道上住着的人要么靠现成的资金生活，要么靠做官从国库领来的薪金生活，此外还有八条彼此平行的街道，大约有三俄里^①长，街的尽头伸展到高冈后面，住在这八条街上的人又靠什么生活呢，这对我来说永远是个猜不透的谜。至于这些人在怎样生活，说来真叫人难为情！没有公园，没有剧院，没有像样的乐队。市立图书馆和俱乐部的图书馆只有犹太籍的少年才去，因此杂志和新书放在那儿，一连好几个月没有人去翻开书页。有钱的和有知识的人睡在又窄又闷的卧室里，躺在满是臭虫的木床上。孩子们住在脏得使人恶心的房间里，还美其名曰“儿童室”。至于仆人，哪怕是年纪大的老仆人，也睡在厨房的地板上，盖着破被子。在平常日子，屋子里有红甜菜汤的气味，到持斋的日子就有用葵花子油煎的鲟鱼的气味。他们吃没有滋味的菜，喝不卫生的水。很多年来，在议会里，在省长家里，在主教家里，在各处屋子里，人们一直谈到我们城里没有价钱便宜、清洁卫生的水，说必须向国库借二十万卢布来安装自来水。很有钱的富翁在我们城里不下三十个，有时候，打一场牌就输掉整整一个庄园，他们也喝这种脏水；可是却一辈子热衷于谈借款，这种事我真弄不懂，我觉得他们干脆从自己口袋

^① 1 俄里等于 1.06 公里。

里拿出那二十万卢布来要简单多了。

在全城当中我没见过一个正直的人。我父亲收受贿赂，认为人家是出于尊敬他的品德才献给他的。中学生们为了升级而到教师家里食宿，教师乘机收下他们大笔的钱。军官的太太在招募新兵时期接受新兵的贿赂，甚至容许新兵邀她去吃喝。有一回她在教堂里跪下去以后怎么也站不起来，因为她喝醉了。在招募新兵时期就连医生也接受贿赂。本城的医生和兽医向肉铺和酒馆要钱。县立学校出售三等优惠证书。监督司祭向下面的教士和教堂长老索取贿赂。在市政机关里，在市民机关里，在医务机关里，在别的一切机关里，每个申请者办完事，刚要走，就会有人朝着他的背影喊叫：“应当表示感激才行啊！”那个申请者只好走回来，给他们三十到四十个戈比。凡是不接受贿赂的人，例如司法机关的官员，总是傲慢无礼，跟别人握手的时候只伸出两个手指头，为人十分冷酷，见解极其狭隘，极爱打牌，喝很多酒，娶有钱的女人，对他们四周的人无疑地起着有害的、腐化的影响。只有从姑娘们身上才散发出道德纯洁的气息，她们大多怀有高尚的理想，正直纯洁的灵魂；可是她们不懂生活，相信给人贿赂是出于对那人的品德的尊重，而且出嫁以后很快就衰老、堕落，不可救药地陷在庸俗的小市民生活的泥潭里了。

三

我们这个地区正在修建铁路。每逢假日的前夕，就有一群群衣衫褴褛的人在城里走来走去，城里人叫他们“铁炉子”，大家怕他们。我常常看见衣衫褴褛的人脸上带着血迹，头上没戴帽子，被人拉到警察局去，后面跟着人，手里拿着一个茶炊或者一件不久以前洗过、现在还湿着的内衣，作为物证。“铁炉子”通常聚集在小酒店附近和集市上；他们喝酒，吃东西，骂下流话，碰见举动轻佻的女人路过就吹出刺耳的口哨声。我们的小铺老板为了给这些饿着肚子、衣衫褴褛的人开开心，就用白酒把一条狗和一只猫灌醉，或者在狗尾巴上拴一个空煤油桶，吹一声口哨，那条狗就沿着街道飞跑，铁桶轰隆隆地响起来，吓得那只狗尖声乱叫，以为身后追来一个什么怪物，